

人工智能翻译与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对比研究 ——以文化负载词处理为中心

黄丹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广西 崇左 532200

DOI: 10.61369/RTED.2025190025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翻译的快速发展，其在文学翻译中对文化负载词的“零叛逆”直译策略，与译者基于“创造性叛逆”的文化适应性改写形成鲜明对比。本文以刘宇昆译版《三体》中的典型文化负载词为研究对象，对比人工智能翻译工具与刘宇昆创造性叛的处理差异，核心探讨“零叛逆”直译与创造性改写在文化负载词跨文化传播中的不同，探索人机协作模式下忠实性与创造性的平衡，为人工智能时代文学翻译的实践优化提供可能的参考。

关键词：人工智能；文学翻译；创造性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AI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ors' Creative Treason: Focusing on the Processing of Culture-Loaded Words

Huang Da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ongzuo, Guangxi 532200

Abstract :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witnessed a sharp contrast between a "no rebellion" translation strategy with the translator's "creative rebellion". This article studies typical culturally loaded words in Liu Yukun's translated version of "The Three-Body Problem,"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in words and phrases by AI translation tools and Liu Yukun's creative rebellion. The core discussion centers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irect translation of "zero rebellion" and creative rewriting in the cross-cultural dissemination of culturally loaded words, exploring the balance between fidelity and creativity in a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model, and providing possible references for optimizing the practic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words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terary translation; creative treason

一、研究背景

数字化浪潮的席卷，使得人工智能翻译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到文学领域。这一技术的应用，既带来了翻译效率的革命性提升，也引发了诸多关于文学本质与翻译伦理的争议，并形成了效率与争议并存的现状（李玲玲，王晓燕，2021）^[4]。

单从效率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翻译技术无疑为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传播注入了活力。以往，翻译一部文学作品往往需要花费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其间，译者需要反复推敲字词、斟酌语句、并查阅相关资料，才能更好地保障译文的准确性与流畅性。而如今，借助人工智能翻译，在较短的时间内，译者就可以获得初步译文。这无疑缩短了翻译周期，让更多的文学作品能够跨越语言障碍走向世界。然而，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在文学领域的应用并非只有益处。其面临的最核心的争议就在于：人工智能翻译能否真正传达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与情感深度？文学作品不同于普通的信息文本，它蕴含着作者独特的思想情感、鲜明的个人风格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人工智能翻译虽然能在词汇和语法层面实现转换，但往往难以准确捕捉和传达字里行间的修辞手法，以及作

品所承载的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袁筱一，罗茜，2025）^[8]。而在这些难以表达的内容中，文化负载词就是其中一项具有翻译技术难度的部分，因此时常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吴文艳，2014）^[7]。简要来说，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在文学领域的应用有利有弊，它带来效率提升的同时，也面临着极大争议。其中，在文化负载词方面，人工智能翻译与译者创造性改写的冲突，就反映了技术理性与人文主体性在文学翻译领域的博弈。如何发挥人工智能翻译的技术优势，同时又兼顾文学作品的人文内涵，是该领域需要探索的课题。

二、研究现状

(一) 创造性叛逆理论的发展

创造性叛逆理论是翻译研究领域的重要理论之一，由法国文学家 Robert Escarpit 提出。其内涵在于，翻译不是对原文的简单复制，而是译者在理解原文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文化背景、认知水平以及翻译目的，对原文进行创造性改写。Robert 认为，这种叛逆并非是对原文的背离，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翻译的

目的，使译文在目标语言文化中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从分类来看，创造性叛逆主要包括译者主体性和目的语文化导向。译者主体性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是被动接受原文，而是主动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对原文进行选择、解读以及再创作（宁双，2011）^[5]。而目的语文化导向，则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和读者的阅读习惯，对原文进行适当调整和改写，从而使译文更符合目标语言文化的规范和审美^[6]。

不过，创造性叛逆理论在文学翻译中也存在争议。例如，封宗颖（2014）就认为，过度的创造性叛逆会破坏原文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因此违背了翻译的忠实原则，使译文失去原作的韵味和文化特色。但同时也有其他观点认为，在文学翻译中，适当的创造性叛逆是必要的，它能够使译文更好地与目标语言文化融合，让读者更深入地欣赏文学作品，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传播（张敏，2009）^[3,9]。

（二）人工智能翻译在文化负载词处理中的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翻译领域的发展，其对文化负载词的处理成为研究热点。在技术上，目前人工智能在翻译处理文化负载词时，主要依托于大规模语料库和深度学习。通过对平行语料的训练，人工智能模型能够学习到文化负载词在不同语境下的常见译法。而神经机器翻译则通过构建复杂的神经网络，试图捕捉文化负载词更深层次的语义关联，实现更贴切的翻译（郑国锋，潘曠，2025）^[10]。然而，人工智能翻译在处理文化负载词时存在明显局限：一方面，机械对应的现象频出，人工智能模型往往只能根据字面上的匹配进行翻译，难以考虑文化负载词背后的文化内涵，比如将中国的“饺子”翻译为“dumpling”，虽然在字面上有一定对应，但“dumpling”在目的语中所涵盖的范围更广，无法准确体现“饺子”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所代表的“阖家团圆”的寓意；另一方面，情感信息会有所损耗，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使得许多词汇所蕴含的情感信息在翻译过程中难以完整保留（陈诺，2024）^[2]。像“红娘”“穿小鞋”等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文化负载词，人工智能翻译可能仅进行字面转换，或者寻找目的语中类似的词汇进行替代，但对于文化负载背后的情感内涵，则无法有效传达。

（三）刘宇昆翻译实践研究

刘宇昆是中西方科幻小说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译者，他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处理上，展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他拥有中西方双重文化背景：国内成长，国外求学，是一位中西方科幻小说爱好者，同时也是一位科幻文学作家。这些背景使得他在翻译文化负载词时，能够更好地理解两种文化的差异和关联。在翻译过程中，他没有简单地进行字面转换，而是根据具体语境，采用灵活的叛逆性改写。具体来说，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如《三体》）中的一些具有浓厚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时，他会结合西方读者的认知习惯，在保留文化内涵的前提下，选择更易于西方读者理解的表达方式（吴庆娟，张丽云，2021）^[6]。这种“双重文化身份”下的改写策略，使得刘宇昆的译文在保持原作精神的同时，能够很好地适应目标语言文化环境，受到西方读者的认可和喜爱，也为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现有研究不足

尽管目前在人工智能翻译、创造性叛逆理论等方面已有不少研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1. 缺乏工智能翻译与优秀译者在文化负载词处理上的对比。现有研究多分别关注一方翻译特征，无法清晰地看出人工智能翻译与优秀译者在处理文本的优势与劣势，也较难判定人工智能翻译在哪些方面可以借鉴优秀译者的经验；2. 也有部分关注人工智能与译者原文对比的研究者，但其关注的领域相对来说更为宏观，对于更具体的方向，如文化负载词等，研究得并不特别深入。因此，针对以上情况，本研究拟对比人工智能翻译与刘宇昆译本处理文化负载词的具体差异，探索人机协作模式下平衡翻译忠实性与创造性的可行路径。

三、研究设计

基于代表性与普及度，本研究主要选取 deepseek 进行中译英版本的翻译。同时，因刘宇昆译本的《三体》在处理中国文化负载词时的创造性与跨文化传播影响力，我们将其作为主要的研究译本，从其中筛选出较为典型的文化负载词进行处理。在此基础上，梳理人工智能翻译技术原理、创造性叛逆理论的相关重要文献，从中确认具体的研究问题后，从翻译策略和文化信息保留度两方面，对比人工智能与刘宇昆的处理方式，针对典型文化负载词（如“知青”、“热炕”、“道”等）进行剖析。

四、人工智能翻译与刘宇昆译本在文化负载词处理上的差异分析

（一）人工智能翻译的“零叛逆”直译倾向

人工智能翻译目前主要依赖于大规模语料库的匹配与统计概率，体现出“忠实行于字面形式”的特征，所以具有“零叛逆”的倾向。这种策略在处理高频通用词汇时效率显著，但面对文化负载词时就会暴露局限。具体来说，“知青”一词，人工智能会译为“educated youth”，仅保留“有知识的年轻人”这一表层含义，但剥离了“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背景，不易于读者解读历史背景；“热炕”译为“hot kang”时，虽通过音译“kang”保留了文化特异性，但未补充“砖石结构”“冬季取暖”“全家共居”等内容，导致目标语读者可能将其误解为“加热的床”或“某种特殊家具”；而“道”译为“Dao”，“气”译为“Qi”，虽然是文化符号的显性存在，确容易产生阅读难度，对读者来说也是一个挑战。这种直译导致的文化信息损耗具有双重后果：一方面，历史背景（如“知青”的时代使命）、功能逻辑（如“热炕”的取暖原理）等隐性内涵的缺失，使词汇沦为孤立的符号，读者无法有效串联信息；另一方面，因缺乏文化参照系，读者易产生认知断层，甚至引发误读，例如，将“人民公社”简单等同于“community”，而忽视了其集体生产的属性。

（二）刘宇昆的创造性改写策略

作为兼具中西文化背景的译者，刘宇昆的策略核心

是“以目标语读者为中心的文化搭桥”，通过创造性改写实现“功能对等”而非“形式对等”。处理“知青”时，他增译“young intellectuals sent to the countrysid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通过锚定历史坐标，以“sent to the countryside”补充行为背景，使目标语读者能把握这一群体的时代属性；翻译“热炕”时，采用“a heated brick bed, a traditional feature of northern Chinese homes”的表述，先用“heated brick bed”解释物理属性，再以“traditional feature of northern Chinese homes”定位文化场景，既保留了“炕”的独特性，又消除了理解障碍；同时，刘宇昆的改写策略通过“意义补偿”实现内涵的深层传递，具体来说，他将“道”译为“the Way, the underlying order of the universe”，以“underlying order of the universe”补充哲学内涵；他还将“人民公社”翻译为“People's Commune”，这种译法能准确传达“人民公社”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组织形式的含义，因为西方历史上，也有类似“巴黎公社”这样的用法，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政治内涵，与中国的“人民公社”在组织形式和性质上有一定的相似性，用“People's Commune”来翻译可以让英语读者对“人民公社”有一个初步的、较为准确的理解。

此外，他在文中翻译“面子”时，译为“social prestige, which depends on one's reputation and relationships”，通过解释性表述还原其社会文化意义。这种策略虽可能偏离原语形式，但实现了“意义优先”的传播目标；将“单位”译为“work unit, which provided housing, healthcare, and social welfare”，通过补充附加信息，让西方读者理解这一制度的“全能性”特征。这种策略源于刘宇昆对“跨文化传播本质”的深刻

认知——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意义的重新编码。他的改写始终基于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认知图谱，在保留异质性与确保可读性之间寻找平衡点。

五、人机协作模式下忠实性与创造性的平衡路径

通过以上对比，研究发现，人工智能的直译倾向源于其技术逻辑：依赖数据训练形成的最优匹配算法，缺乏对文化语境的深层理解与主观判断能力，本质是工具理性的体现；而刘宇昆的创造性改写则基于人文感知与传播目的：他既深谙源语文化的精神内核，又能预判目标语读者的认知盲区，其决策始终服务于让文化内涵被准确感知的终极目标，体现了目的论指导下的译者主体性。

由此本研究认为，人工译者依然是翻译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人工智能翻译与创造性叛逆可以进行适度结合。而在译者的翻译经验基础上，人工智能软件的开发者也可以适度参考译者的经验。具体来说，译者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完成文化负载词的初步直译与平行语料检索，提供基础参考，进行更细致地翻译与解析；而人工智能翻译软件的开发者，也可以根据以上所存在的问题，开发文化语境标注功能，对特定名词所关联的历史事件进行适度提示，辅助译者判断改写必要性。在此操作中，译者的核心作用在于，根据传播目标，对人工智能直译结果进行二次加工，以求对核心文化符号保留适度异化，维护文化独特性，同时对高语境依赖词进行创造性补偿，确保传播效度，最终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

参考文献

- [1] 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M].王华美,于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 [2] 陈诺.文化翻译视角下AI与人工翻译的比较[C]//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际论坛组委会,沈阳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北亚语言学文学和教学国际论坛论文集(II).湖南工商大学;,2023:337-343.
- [3] 封宗颖.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实为深度的“忠实”[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9(01):110-116.
- [4] 李玲玲,王晓燕.人工智能翻译对文学文本处理的对比分析——以搜狗翻译和ChatGPT翻译为例[J].时代报告(奔流),2023,(12):10-12.
- [5] 宁双.从“译者的隐身”到“创造性叛逆”——译者主体地位的确立[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4):135-137.
- [6] 吴庆娟,张丽云.刘宇昆《三体》英译本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研究[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8):143-146.
- [7] 吴文艳.外宣翻译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原则与方法[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7(06):166-170.
- [8] 袁筱一,罗茜.人工智能与文学翻译的未来——基于人机文学翻译对比研究的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25,(02):1-9+145.
- [9] 张敏.浅论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及其限度[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9,18(04):101-102.
- [10] 郑国锋,潘曦.人工智能时代的术语机器翻译:挑战与出路[J].中国外语,2025,22(04):96-104.